

秀吉

【美】玛丽·伊丽莎白·贝里 著

赵坚 张珠江 译

Hideyoshi

刘东 主编

西方日本研究丛书

江苏人民出版社



秀吉

【美】玛丽·伊丽莎白·贝里 著

赵坚 张珠江 译

Hideyoshi

刘东 主编
西方日本研究丛书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秀吉/(美)贝里著;赵坚,张珠江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2. 5

(西方日本研究丛书)

ISBN 978-7-214-08143-8

I. ①秀… II. ①贝…②赵…③张… III. ①丰臣秀
吉(1536~1598)—人物研究 IV. ①K833.135.2

·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82176 号

Hideyoshi by Mary Elizabeth Berry, was first published by th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USA, in 1982. Copyright © 1982 by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Translated and distributed by permission of th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rights © 2012 by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0-2010-371

书 名 秀吉

作 者	[美]玛丽·伊丽莎白·贝里
译 者	赵 坚 张珠江
责 任 编 辑	周晓阳
装 帧 设 计	刘 葶 葶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集 团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集 团 网 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book-wind.com http://jsrmcbs.tmall.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0 毫米×1 304 毫米 1/32
印 张	10.25 插页 2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214-08143-8
定 价	28.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总序：西方日本研究丛书

这又会是一个卷帙浩繁的移译工程！而且，从知识生产的脉络上讲，它也正是上一个浩大工程——“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姊妹篇，也就是说，它们都集中反映了海外学府（特别是美国大学）研究东亚某一国别的成果。

然而，虽说两套书“本是同根生”，却又完全可以预料，若就汉语世界的阅读心理而言，这后一套丛书的内容，会让读者更感生疏和隔膜。如果对于前者，人们还因为稟有自家的经验和传统，以及相对雄厚的学术积累，经常有可能去挑挑刺、较较劲，那么对于后者，恐怕大多数情况下都会难以置喙。

或许有人要争辩说，这样的阅读经验也没有多少不正常。毕竟，以往那套中国研究丛书所讲述的，乃是自己耳濡目染的家常事，缘此大家在开卷的过程中，自会调动原有的知识储备，去进行挑剔、补正、辩难与对话。而相形之下，眼下这套日本研究丛书所涉及的，却是一个外在文明的异样情节，人们对此当然只会浮光掠影和一知半解。

不过，设若考虑到这个文明距离我们如此之近，考虑到它在当今国际的权重如此之大，考虑到它跟传统中华的瓜葛如此之深，考虑到它对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产生过如此严重的路径干扰与路径互动，那我们至少应当醒悟到，无论如何都不该对它如此陌生——尤其不该的是，又仅仅基于一种

基本无知的状态,就对这个邻近的文明抱定了先入为主的态度。

还是从知识生产的脉络来分析,我们在这方面的盲点与被动,至少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长期政治挂帅的部颁教育内容所引起的。正如上世纪50年代的外语教学,曾经一边倒地拥抱“老大哥”一样,自从60年代中苏分裂以来,它又不假思索地倒向了据说代表着全球化的英语,认定了这才是“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国际普通话”。由此,国内从事日本研究的学者,以及从事所有其他非英语国家研究的学者,就基本上只能来自被称作“小语种”的相对冷门的专业,从而只属于某些学外语出身的小圈子,其经费来源不是来自国内政府,就是来自被研究国度的官方或财团。

正因此才能想象,何以同远在天边的美国相比,我们反而对一个近在眼前的强邻,了解得如此不成正比。甚至,就连不少在其他方面很有素养的学者和文化人,一旦谈起东邻日本来,也往往只在跟从通俗的异国形象——不是去蔑视小日本,就是在惧怕大日本。而更加荒唐的是,他们如此不假思索地厌恶日本人,似乎完全无意了解他们的文化,却又如此无条件地喜欢日本的产品,忽略了这些器物玩好的产生过程……凡此种种,若就文化教养的原意而言,都还不能算是完整齐备的教养。

与此同时,又正因此才能想象,如此复杂而微妙的中日关系,如此需要强大平衡感的困难课题,一旦到了媒体的专家访谈那里,往往竟如此令人失望,要么一味宣扬一衣带水,要么一味指斥靖国神社。很少见到这样的专门家,能够基于自己的专门知识和专业立场,并非先意承旨地去演绎某些话语,而是去启迪和引导一种正确的阅读。

那么,除了那两种漫画式的前景,更广阔的正态分布究竟是怎样的?总不至于这两个重要邻邦,除了百年好合的这一极端,就只有你死我活的另一极端吧?——由此真让人担心,这种对于外来文明的无知,特别是当它还是极其重要的近邻时,说不定到了哪一天,就会引发代价惨重的、原本并非不可避免的灾祸。确实,要是在人们的心理中,并不存在一

个广阔的理解空间，还只像个无知娃娃那样奉行简单的善恶二元论，那就很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作为一介书生，所能想出的期望有所改善的手段，也就只有号召进行针对性的阅读了，并且，还必须为此做出艰苦的努力，预先提供足够的相关读物；此外，鉴于我们国家的大政方针，终将越来越走向民主化，所以这种阅读的范围，也就不应仅限于少数精英。正是诸如此类的焦虑，构成了这套丛书的立项理由——正如在上一套丛书中，我们曾集中引进了西方自费正清以降的、有关中国研究的主要学术成果，眼下我们在新的丛书中，也将集中引进西方自赖肖尔以降的、有关日本研究的主要研究成果。

我们当然并不指望，甫一入手就获得广泛的反响和认同。回想起来，对于大体上类似的疑问——为什么满足理解中国的精神冲动，反要借助于西方学界的最新成果？我们几乎花去了二十年的不倦译介，才较为充分地向公众解释清楚。因而，我们现在也同样意识到，恐怕还要再费至少十年的心血，才能让读者不再存疑：为什么加强理解日本的途径，也要取道大洋彼岸的学术界。不过我却相信，大家终将从这些作者笔下，再次体会到怎样才算作一个文化大国——那是在广谱的意义上，喻指学术的精细、博大与原创，而并非只是照猫画虎地去统计专著和论文数量，而完全不计较它们的内在质量。

我还相信，由于这套丛书的基本作者队伍，来自我们二战时期的盟国，所以这些著作对国内读者而言，无形中还会有一定的免疫力，即使不见得全信其客观公正性，至少也不会激起或唤醒惯性的反感。此外，由于这些著作的写作初衷，原是针对西方读者——也即针对日本文化的外乡人——所以它们一旦被转译成中文，无意中也就有一种顺带的便利：每当涉及日本特有的细节和掌故时，作者往往会为了读者的方便，而不厌其烦地做出解释和给出注释；而相形之下，如果换由日本本土学者来处理，他们就不大会意识到这些障碍，差不多肯定要一带而过。

不待言,这面来自其他他者的学术镜子,尽管可以帮助我们清洗视野和拓宽视角,却不能用来覆盖我们自身的日本经验,不能用来取代我们基于日文材料的第一手研究——尤其重要的是,不能用来置换中日双边的亲历对话,以及在此对话中升华出来的独自思考。而最理想的情况应当是,一旦经由这种阅读而引起了兴趣和建立了通识,大家就会追根究底地上溯到原初语境去,到那里以更亲切的经验,来验证、磨勘与增益它们。

无论如何,最令人欣慰的是,随着国力的上升和自信的增强,中华民族终于成长到了这样一个时刻,它在整个国际格局中所享有的内外条件,使之已经不仅可以向其国民提供更为多元和广角的图书内容,还更可以向他们提供足以沉着阅读和平心思考这些图书的语境。而这样一来,这个曾在激烈生存竞争中为我国造成了极大祸害的强邻,究竟在其充满曲折与陷阱的发展道路上,经历了哪些契机与选择、成功与失败、苦痛与狂喜、收益与教训,也已足以被平心静气地纳入我们自己的知识储备。而借助于这样的知识,我们当然也就有可能既升入更开阔的历史长时段,又潜回充满变幻偶因的具体历史关口,去逐渐建立起全面、平衡、合理与弹性的日本观,从而在今后同样充满类似机遇的发展道路上,既不惮于提示和防范它曾有的失足,也不耻于承认和效仿它已有的成功。

我经常这样来发出畅想:一方面,由于西方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的剧烈冲击,也许在当今的世界上,再没有哪一个区域,能比我们东亚更像个巨大的火药桶了;然而另一方面,又因为长期同被儒家文化所化育熏陶,在当今的世界上,你也找不出另一块土地,能如这方热土那样高速地崛起,就像改变着整个地貌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一样——能和中日韩三国比试权重的另一个角落,究竟在地球的什么地方呢?只怕就连曾经长期引领世界潮流的英法德,都要让我们一马了!由此可知,我们脚下原是一个极有前途的人类文化圈,只要圈中的所有灵长类动物,都能有足够的智慧和雅量,来处理 and 弥合在后发现代化进程中曾经难免出现的应力与裂痕。

此外还要提请注意，随着这套丛书的逐步面世，大家才能更真切地体会到，早先那套连续出版了一百多种，而且越来越有读者缘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在其知识创化的原生态中，实则是跟这套“西方日本研究丛书”相伴而生的。作为同一个区域研究的对象，它们往往享有共通的框架与范式，也往往相互构成了对话基础和学术背景。而由此也就不难联想到，尽管西方的区域研究也在面临种种自身的问题，但它至少会在同一个地区谱系中，或在同一个参考框架下，把中日当作两个密不可分的文明，来进行更为宏观的对比研究——这就注定要启发我们：即使只打算把中国当作研究对象，也必须蔚成一种比对日本来观察中国的宽广学风，因为确有不少曾经百思不得其解的难题，只要拿到中日对比的大框架下，就会昭然若揭，迎刃而解。

最后，由于翻译此套丛书的任务特别艰巨，既要求译者通晓英文，又要求他们了解日本，也由于现行的学术验收体制，不太看重哪怕是最严肃的翻译工作，给这类唯此为大的学术工作平添了障碍，所以，对于所有热心参赞此项工程的同侪，我既要预先恳请他们随时睁大眼睛，也要预先向他们表达崇高的敬意；并且——请原谅我斗胆这样说——也为他们万一有什么“老虎打盹”的地方，预先从读者那里祈求谅解。当然，这绝不是一个“预先免责”的声明，好像从此就可以放开手脚去犯任何错误了。可无论如何，我们想要透过这套书提供的，绝不是又有哪位译者在哪个细节上犯下了哪类错误的新闻，而是许多译者经由十分艰苦的还原，总算呈现在图书中的有关日本文明的基本事实——无论知我罪我，我还是把这句老实话讲出来，以使大家的目力得以穿透细枝末节，而抵达更加宏大、久远和深层的问题！

刘 东

2009年8月16日于静之湖·沐暄堂

献给

唐纳德·霍华德·谢弗利

译者序

从“应仁之乱”(1467)到“大阪之阵”(1616)的 150 年,在日本历史上称为“战国时期”,是动荡时间最长、波及范围最广、社会变动最剧、历史人物最为活跃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是日本前近代史上最具有戏剧性,因而也是最为精彩的一段历史。近代以来,对这一段血腥与辉煌、角力与谋略、刀光剑影与歌舞升平、新与旧、生与死的强烈冲撞和对照的历史时期,历史和文学性叙事可谓卷帙浩瀚、汗牛充栋。日本国会图书馆所收藏的和文书籍,光书题有“战国”一词的竟高达 4200 余种,就算剔除重复以及不同版本,其数目也相当可观,更何况书题虽然不含“战国”一词而内容却关涉战国时代的著述,应该多出好几倍。譬如国会图书馆所藏书名涉及有“战国三杰”之称的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三人的书籍,都各在千种以上。

在这些书籍中,直接关于丰臣秀吉的专著,比较具有学术性的,估计有 500 种之多,其中可列为历史专业参考书并被研究者广泛征引的,至少在百种上下,如小瀬甫庵《太阁记》(1625)、林罗山《丰臣秀吉谱》(1642)、山路爱山《丰太阁》(1909)、渡边世祐《丰太阁与其家族》(1919)、宫川满《太阁检地论》(1955)、奥野高广《信长与秀吉》(1955)、松田毅一

《太阁与外交》(1966)、山冈庄八《丰臣秀吉》(1973)、桑田忠亲《丰臣秀吉研究》(1975)、藤木久志《织田丰臣政权》(1975)、小和田哲男《丰臣秀吉》(1985)、朝尾直弘《天下一统》(1988)、协田修《秀吉的经济感觉》(1991)、小林清志《秀吉权力的形成》(1994)、堺屋太一《秀吉:超越梦想之男》(1998)、童门冬二《信长、秀吉、家康之研究》(2009)以及司马辽太郎《历史中的邂逅:织田信长与丰臣秀吉》(2010)等,都是秀吉研究的翘楚读物。

其中尤其是被誉为“秀吉研究第一人”的桑田忠亲和同样著述等身的小和田哲男两位,都以毕生的精力,从事战国史和秀吉研究,结下丰硕成果。小和田哲男为主编之一的《丰臣秀吉事典》,把秀吉的时代、家系、政策、建筑、政治构造、合战、家臣团、趣味和文献史料列为专栏,下设章节,由各专题出名的专家学者撰写,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丰臣学”事典。不过其成书于1990年,在贝里女士本书的出版之后,因此不在其参考文献之列。而桑田的《丰臣秀吉研究》,是作者在1940年出版第一部研究专著《丰太阁传记物语之研究》之后,荟萃其近四十年的研究功力而成,堪称“秀吉学”的集大成著作。作者从秀吉的出生、从军、发迹到谋略、政策、建树、勋绩、教养、家族、文献来源以及研究经纬,勾勒出秀吉研究的整体框架和涵盖范畴,标志着本书撰写时日本“秀吉研究”的最高成就。

相比之下,迄今关于秀吉的英语文献并不多,20世纪80年代以前就更寥若晨星了。本书提及28种英语论著,仅有德宁《丰臣秀吉的生涯》(1888)和波斯卡罗《秀吉的101封书简》(1975)两种和秀吉直接有关。前书初版于1888年,作者德宁(1846-1913),英国传教士,长期旅居日本,其《日本的往昔》(*Japan in Days of Yore*),比《丰臣秀吉的生涯》早一年出版。德宁这两种书后来在世界各地再版流传,成为很多欧美人了解日本人和日本文化的入门读物。但两书都非学术专著,而属于文学性叙事之作,虽然贝里在本书第92页注释①中称其“引人注目”,不过对本书思路的成形,影响大概非常有限。至于《秀吉的101封书简》,为意大利

“日本学”学者波斯卡罗(1935 -)女士英译的秀吉私人书简集,虽然提供了秀吉研究的一个侧面,但正如本书作者所指出的:“他的家族书简,通常都很简短、俗套和重复,密闭其内心生活。”(本书最后一章“垂暮岁月”)尤其是秀吉晚年的私人书简,缺乏个性色彩,史料价值相当有限。于此可以看出,贝里女士在撰写本书时,英语资源严重匮乏。从这一文献背景而论,作为英语著述的本书,可谓荦路蓝缕。

《秀吉》全书征引共及 156 种文献,其中日语文献超过八成。这些日语文献几乎涉及“秀吉研究”的所有方面,尤其是在资料的辨识梳理、事件来龙去脉的因果和时序排定、学科研究的框架构建上,厥功甚伟,为本书垒下资料文献的厚实基础。虽然日语文献在有关秀吉研究的很多方面都达到“水落石出”的水平,譬如说“太阁检地”的缘由和始末,“兵农分离”的实施与结局,“城下町”的建置与都市政策、“天下征服”合战的布局与展开,佛教“僧兵”围剿与基督徒“追放”,“南蛮”外交与侵朝战争等,日本学者以令人赞叹的细节重视、锲而不舍的学术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再现”和“复原”了历史事件。可以说如果没有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秀吉》一书的主干部分就难以成立。

但是日本学者的“秀吉研究”,在整体构架上比较缺乏逻辑叙事的手眼,往往忽视大背景和具体时间、时代氛围与人物活动、历史整体的有序运动与历史事件的无序展开之间的节点串连。再以《丰臣秀吉研究》和《丰臣秀吉事典》两书为例,其共同优点是构架整然和叙事清晰。《事典》的编排从“时代”到“文献”,让人一目了然,寻检可资参考的条目。《研究》则分人物(出身、性格、后世评价)、事功(天下征服)、治理(政策与制度)、教养(所倡文化)和家族(生母与妻妾)五部,细大不捐,应有尽有。其共同弱点是细部纹理毕现,而各部之间却缺乏逻辑关联。譬如说秀吉在什么样的时代出世,为什么在“信长时代”结束后会有“秀吉时代”,“秀吉时代”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即历史为什么选择秀吉去完成结束“战国”、一统天下的大业,而秀吉本人具备何种人格和能耐可以膺当此一历史重

任？秀吉留给后世的最大遗产是什么？惜乎《事典》和《研究》两者，都未能予以完满回答。

而回答这些问题，成为本书的首要内容。从本书的构成，就可以观察到这些强烈的问题意识与解决的不懈尝试。本书的第1章“丰臣升平”只有短短六页半(中文才四页半)，向读者展示传主这位“农民出身征服者”，以军事及非军事手段，让人惊奇地结束战国时代，给此后日本带来300年和平格局。其后以第2章“一个缺乏中心的世界”，介绍作为秀吉崛起背景的战国时代；第3章“恐怖时期”，叙述织田信长以残酷的军事征服，尝试解决战国问题及其最终失败；第4章“征服和安抚”，则介绍继承信长的秀吉，以军事和非军事两种手段，继续解决战国问题；于是第5章“丰臣政策”，就具体介绍其各项非军事手段；而第6章“联盟及其动机”，主要分析前述非军事措施得以实行的主要平台“联盟”。作者在第1章中曾经表明：“秀吉的联盟是本书最重要的主题”，因此“联盟”式解决为秀吉成功的最主要原因。第7章“追求正统”，叙述秀吉利用“皇权”作为他“联盟”式解决的法理正统，藉以号召诸侯。而最后一章“垂暮岁月”，则重点介绍秀吉晚年的“侵朝战争”和“继承权”问题，以秀吉事业的成功(解决战国问题)和个人以及家族的失败作结。作者将秀吉时代所面临的“问题”以及如何“解决”作为一条逻辑主线，以此“起承转合”，突出了秀吉在“战争”与“和平”两大时代过渡时期所起的显赫作用，为传主的历史存在做了准确的定位。

“织丰政权”一直被人们相提并论，织田和丰臣之间，确实有很多一脉相承之处，如检地、城割、兵农分离、商工发展这些政策，皆非秀吉政权的首创，他只是在统一全国之后大规模实施而已，但是两个政权在根本路线取向上迥不相同。正如作者在第3章描述信长的解决方案最终失败时指出的：“信长开出的整合国土的高昂成本，导致无法看到减缓前景的武装抵抗。作为拥有日本三分之一国土的大名，信长依然面对着毛利、岛津、上杉、伊达、北条和长宗我部势力，这些家族联合起来，就比他

所掌握的势力更为强大。织田势力在 1582 年的进展状况,已经无法保证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通过军事征服的武力解决,已经达到其能力的界限,“暴力性权力集中”,只是解决战国问题的“一个方向”,作者正确地指出还有另一个方向,那就是联盟式的“地方自治”。信长拒斥天皇和幕府,拒绝与地方领主共享资源、分权而治,欲以武力将权力臻于一身,完成国家统一,作者认为这是“战国的旧有传统”。秀吉选择了联盟和分权这一新的方向,而历史于是选择了秀吉。

作者分析出身贫苦的传主,有着异常的“虚荣心”,这一人格特征,使他在征服过程中逐渐倾向于“扮演了一个仁慈的和宽容的保护人”,在武力之外,寻求“疗心效果”,进而确立自己“为一个超越武力的统一者”。联盟于是就成了实施其理念的最佳途径与最适平台。他确认作为自己征服对象的外样大名的领地,清醒地拒绝仿效信长,“让土地向自己的家族集中”,作者在第 4 章分析其“征服和安抚”两手,并以此成功时总结说:“他还愿意把击败者揽入自己的联盟,胜利时绝不残忍,结盟时绝不倨傲,既不依赖内部追随者,又不贪婪土地支配,他提出了脱离信长模式的愿景,使得政治凝聚成为可能。”作者的这一大胆结论,远较许多谨慎细致的日本学者的持论具有说服力。历史并非盲目地选择了秀吉,而信长的失败,作为历史选择的参照系,让秀吉得以从众多织田诸侯中胜出,并完成织田的未竟之业。

第 5 章到第 7 章为本书的主干部分,叙述秀吉政权在“一统天下”之后所实施的具体政策,以及通过“联盟”这一与地方分权的方式、借重“万世一系”的法统来源“皇权”实施这些基本政策的过程。比起前四章创新迭出、议论风发来,这三章平稳行文,充斥案例与数据,广征博引,大量采纳日本学者的既有研究成果,向读者端出丰臣留给后世的“遗产”。在作者看来,“丰臣政体是秀吉留给后继者的最伟大遗产。得益于其军事成就的社会和政治解决方案,证明是远为重要的和持久的胜利。虽然政权会被易手,德川幕府的世代将军及其大名,几乎没有更改统治的丰臣框

架。1650年代的和平,归功于这位最先统一战国的将领,更归功于这位为统一创造坚实环境的统治者。”(第5章)作者对秀吉的历史定位,无疑是相当准确的。

第8章“垂暮岁月”,叙说秀吉晚年的两大主题:“入侵朝鲜”和“继承权”,叙事重新回归“精彩”,不过也因此不乏“偏颇”之处。譬如说作者坚信秀吉行为很多都源于其“暴发户”的“虚荣心”,她在第7章以“显贵的盛典”和“公众夸示”两个专节,提出其问题。在第8章里,作者又提出秀吉生涯最后十年的两个所谓“超验”问题:即如何“确立继承人”和让自己“名垂青史”。作者声称:“秀吉的抱负从来都不曾摆脱傲慢,其自豪永远和虚荣相连,以及其权力总是受到腐败的侵蚀。”这也对大部分日本学者来说是“闻所未闻”的。秀吉的“低贱”出身,当然影响他日后的待人接物和权力行使,但是他平定天下的“抱负”,并非仅仅出于“傲慢”,他对自己“勋绩”的“自豪”,也并不总是与“虚荣”纠缠,而且权力受到“腐败”侵蚀,并不是因为他出身“低贱”的缘故,其他“世代”大名也或多或少受到侵蚀,影响他们的决策。

为了说明秀吉举措的动机,作者一再引用路易斯·弗洛伊斯于1586年受到秀吉在大阪城接见时的谈话,说秀吉“侵朝”、“入唐”的野望,来自其“将来会称他为敢于从事此大业的第一个日本主君”这种“虚荣心”的驱使。弗洛伊斯甚至还假定:“如果他成功了,中国人向他臣服,他不会夺走他们的国家,也不会留在那里……因为他只希望他们承认他为主人。”作者似乎偏向于相信弗氏的观察,继续引用秀吉本人致朝鲜国王的书简:“予愿无他,只显佳名于三国而已。”于是得出结论,称秀吉侵朝战争“索要的是敬意,而非控制”。因此当秀吉的议和条件遭到大明皇帝的轻侮拒绝时,作者解释说秀吉“不能容忍羞辱,并从心里把第一次远征作为一件终结的、如今毫无意义之事而加以摒除,秀吉向朝鲜半岛发动一场新的战争。这一决策有某种恒定性,一种捍卫自己及其军队荣誉的决心。但是也有当其名声,或许其继承人的尊严受到伤害时,其为人所熟

悉的节制能力的缺失。”将两次侵朝战争简单化地描述为确立、捍卫和挽救“声誉”，而且“为了挽救其声誉，秀吉造成重大损害。他也再次表明他对自己形象的执着，驱使他走向邪恶之行”。

更有意思的是，作者在全书之尾时，以这么一段富于感性与知性的评论作结：“秀吉赋予自己多重角色，可以需要的方式去死。直到生命终结，其灵魂的一部分，仍然在其观众的掌握之中。”似乎秀吉的一生，受其对“名声”和“声誉”追求欲望的驱遣，身不由己。译者因此也忽发奇想，如果作者的判断属实的话，“秀吉”之名，应该倒过来读为“吉秀”，即“吉”（good）之“秀”（show），在日本国民的大舞台前，举行“上佳之表演”。

“名声驱使”说，显然失诸偏颇。秀吉侵朝战争的动机，至今在学界依然是聚讼纷纭的议题。本书的中文版译者相信，秀吉在统一日本后“放眼”东亚和世界，其一是日本统治者对西洋大航海时代与殖民地运动最初的回应，秀吉希望通过“进出”、“立足”半岛和大陆，藉以“领袖”东洋，抗衡西夷。明治时代后期，日本挑起的“日清战争”和“日俄战争”，以及后来所谓的“大东亚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日本军部以及一部分好战学者的说辞，和秀吉的动机应该“出自一揆”。其二，正如一部分日本学者所揣测的一般，织田信长消灭了足利幕府，明智光秀除掉了织田信长，秀吉虽然名尊皇室，只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勾当，他的终极目标却是通过成功“王化”三国（朝鲜、大明和印度）的盖天勋绩，凌驾日本皇室，使自己的一族最终取代日本的皇族，并成为亚洲的霸主。囿于篇幅的局限，此处未能多加申论，不过作者的“名声驱使”说，却是明显缺乏说服力的。

本书佳处，虽是荦荦大端，但也难掩其随处可睹的问题和缺失。除了上述稍嫌偏颇的持论之外，全书日语资料的英译，显然难以让人安心惬意。尤其是将其译成中文，译者起初还是以英文原著为准，后来对勘所引日语原书，发现问题超出了不同语言之间逐译所允许的歧异甚至讹误，于是回顾全书的大部分引文，对照或者径照原著予以重译，这些所

在,大多都在“全书注释”中的相应处,以“译者注”的方式予以指明,必要时甚至还在文本中作注说明。

例如作者把“討ち取り”译成“讨伐并俘虏”(cut through them and many were taken),显然是望文生义。这里的“取り”没有“抓获”之意,很难想象突袭队在追袭敌军时,还会抓获俘虏,事实上秀吉的原文是把所遭遇的敌兵全都砍杀了。(见第3章“恐怖时期”的“幕府的崩溃”一节)

再如作者在叙及地名“长浜”(原名为“今浜”)时发挥说:“秀吉将港口重新命名为长浜——‘长’寓意‘长远’,比‘今’的‘现在和当下’更为合适。”(见第3章“恐怖时期”)其实秀吉是以主公“信长”之“长”,改名“今浜”为“长浜”,以讨好取悦信长。秀吉出身草根阶层,其性格之狡黠,于此并非初见。民间故事称他初投信长时,为其扈从,冬日侍候主人起居,觑其即将起身,先将其履履置于怀中捂热,不仅让信长登鞋后感受体温,也让他对仆从的耿耿忠心大为动容,于是视秀吉为亲信,不次拔擢。民间故事未必真有其事,而秀吉之心迹则于此可循。秀吉在信长帐下时,常窥信长颜色行事,能屈能伸,作为大抵如此。作者当然知道这一类故事,但于书中一律不取,大概是嫌其“英雄气短”吧。

又如第5章作者转引秀吉亲信三宝院住持和尚义演的日记,说明秀吉政权的行政体制。其原文为:“传闻,太阁御所御不例不快云云,珍事祈念之外无他事。浅野弹正(长政)、增田右卫门尉(长盛)、石田治部少辅(三成)、德善院、长束大藏大辅,五人被相定,日本国中之仪申付了。昨日右五人缘边,各罢成云云,是御意也。”本意为义演听闻秀吉病重,日夜为其祈祷。当时执掌行政的所谓“五奉行”浅野、增田、石田、前田和长束五人,被叫到病榻前“缘边”。作者不明其意,将其译成“called to his side”(召来身边),就把这段引文的要点给遗漏了。日语“缘边”的语义为“结成姻亲”,即病入膏肓的秀吉指示最获其信任的“五奉行”,相互结成姻亲,抱成一团,与德川为首的“五大老”形成权力平衡,在他命归西天之